

加強行政主導 切實推動高質量發展



國家主席習近平高度重視香港發展，去年聽取行政長官李家超述職時，對香港特區政府提出「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的明確要求。今年以來，由提出編制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到日前與立法會議員對談交流，李家超積極開創施政新風尚，充分體現行政長官擔負特區第一責任人主動作為的行政主導制度優勢。面向「十五五」時期，國家發展時不我待，香港更要秉持行政主導，集中力量加快推動各項對接國家部署和香港創新改革的發展工作，趕上國家發展快車，讓「一國兩制」事業展現出更強生命力和優越性。

姚志勝 全國政協常委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行政主導原則在香港實行以來，充分體現了此制度的強大生命力和優越性。去年12月，國家主席習近平聽取行政長官李家超述職時，明確指出「特別行政區政府要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扎實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今年1月，中共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 促進特別行政區良政善治」專題研討會上致辭，解讀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對於香港社會理解和落實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精神具有指導意義。

行政主導是特區治理必然要求

夏主任在致辭中指出，「實行行政主導，充分發揮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主導作用，有利於提升政權機關的功能和效率，有利於團結方方面面的力量，靈活應對各種風險挑戰，維護香港、澳門的繁榮穩定。」他又提到實行行政主導的「三個必然要求」：實行行政主導是維護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的必然要求；實行行政主導是確保「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必然要求；實行行政主導是從港澳實際出發、實現特別行政區高效治理的必然要求。「三個必然要求」精準概括行政主導在香港特區治理中的重要原則。

李家超引領特區政府和廣大市民編制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高度體現行政主導的重要性與關鍵性。這是李家超落實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精神的務實行動，不僅推動香港全面高效對接國家戰略、破解深層次矛盾，體現行政長官擔起特區第一責任人的責任，而且引導社會各界參與制定工作，通過廣泛的社會討論，匯集民

智、凝聚共識、提振信心、匯聚合力，提升香港社會的「當家人」意識。

行政立法緊密合作

面向「十五五」時期，香港治理工作複雜艱巨，但國家發展時不我待，香港更要繼續堅定秉持行政主導原則，提升決策效率與資源調配能力，應對瞬息萬變的國際經濟與金融形勢，主導治理變革實現高質量發展，「以結果為目標」有效施政，特別是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重大規劃，更需以行政主導推動治理革新，以有為政府結合高效市場，走出過去管治工作的條條框框，全速趕上國家發展快車。正如夏主任所指，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要主動識變應變求變，革新管治理念，改進管治方式，善用基本法賦予的權力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破解港澳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

夏主任在致辭中指出，「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需要立法機關、司法機關積極支持配合，形成強大治理合力」，強調特別行政區行政、立法、司法機關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協作配合是行政主導體制的要義所在。這指明了行政立法良性互動，是落實行政主導的重要支撐。李家超上任以來，重視行政立法關係，不斷加強創新行政立法的互動溝通，包括前廳交流會，以及行政長官互動交流答問會；日前舉行的對談交流會，更是行政立法良性互動的新舉措。立法會形成高效務實新風尚，可將行政主導緊密配合的優勢更好發揮出來。

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離不開社會各界支持參與，共同營造落實行政主導的良好社會氛圍。社會各界應更好認識行政主導與香港發展的內在關係和必然要求，全力支持行政主導向好發展。

全港參與匯聚民意 共同繪就發展藍圖

紀緯紋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會員



特區政府編制香港首份五年規劃，是在新時代下，本地發展模式的一次根本性革新。過往香港有年度施政報告對每一年的發展訂立目標，屬於短期部署；如今建立跨周期的中長期發展藍圖，這一延伸是對香港整體競爭力的提升，以及對每一位市民生活福祉的進一步保障。既然這份藍圖關乎未來五年香港的經濟走向、產業布局與民生改善，市民便不能僅止於「知道有這麼一回事」，更不能被動等待政策落地後才感受到其影響。正確的態度應當是主動了解、深入思考，並積極參與到發展藍圖的編制過程之中。除了就香港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收集書面意見外，特區政府舉辦的地區諮詢會，正是將這種「參與」從理念轉化為行動的絕佳契機，為政府與市民搭建直接溝通、彼此交流的橋樑。

以積極行動回應國家規劃

回顧近年國家發展戰略的演進脈絡，香港的角色定位經歷了清晰而重要的轉變。2019年出台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首次將香港與珠三角城市群納入統一的區域發展框架；及後全港市民便見證了一連串銜接、對接和融合的工作與成果。在更為宏觀的層面，國家五年規劃逐步深化對香港的表述，從鼓勵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到國家「十五五」規劃明確香港要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新增一詞，標誌着香港的定位已從國家發展的「參與者」邁向更加積極的「服務者」和「貢獻者」。

在此背景下，香港的發展路徑必須走得更明確、更具策略性和前瞻性。特區政府、社會各界以至於每一位市民，都要集思廣益：未來五年、十年以至更長時間，香港要做什么、如何做、由誰來做才能服務好國家發展大局並把握好巨大機遇？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已為香港發揮獨特優勢指明了方向。從政府層面的頂層設計到市場主體的具體行動，從政策制定者的戰略部署到普通市民的觀念更新，都必須對這些問題有充分的認識和深入的思考。唯有如此，香港才能在新時代的國家發展大局中找準定位。

對特區政府和市民而言，首份香港五年規劃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發展概念，施政報告也不再是過往意義上的施政報告。行政長官李家超明確指出，五年規劃是方向性、宏觀性、策略性的指導文件，而每年的施政報告則是落實五年規劃的年度匯報。兩者一脈相承，共同構成了香港發展的完整治理框架。這意味着，特區政府必須以全新的觀念和態度投入規劃編制工作，跨部門統籌部署，才能有效落實各項發展策略，不負國家和人民的期望。

鼓勵市民踴躍建言

而比行政體制創新更為關鍵的，是觀念的根本轉變。在當前的發展觀念下，市民不僅是政策效果的「受眾」，更應當是國家和香港發展的「參與者」。所以，地區諮詢會在此肩負多重角色，既是政策宣講的講堂，讓市民主動通過第一手渠道透徹理解藍圖戰略意圖；也是民意匯集的渠道，將基層訴求傳達給決策中樞；更是社會共識的孵化器，通過面對面理性討論消弭分歧、凝聚認同。特區政府可藉此即時回應疑慮，將政策語言轉化為貼近生活的具體方案，令規劃編制融入市民日常關切，增強透明度與受認性。

此外，市民的參與不應僅限於地區諮詢會，亦可通過所有有效渠道參與其中。意見和建議上，不只就諮詢文件中的既定內容表達意見，例如同意或反對、支持或建議修改個別發展策略，更可以亦應該主動提出發展方向、策略和具體方案。當市民從被動的政策接受者轉變為主動的藍圖共建者，這份規劃才能真正體現社會各界的共同意志，也才能在執行過程中獲得最廣泛的社會支持。

令人鼓舞的是，特區政府現時已就首份香港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收集到相當大量的意見。這充分反映出，香港市民已習慣亦樂於通過不同有效渠道，為香港的長遠發展積極出謀獻策。市民的積極參與，與主動有為的特區政府攜手並進，正是推動香港社會制度創新強大動力；這些革新後的制度既有量的增長，更有質的提升，是加速香港由治及興的關鍵所在，能為香港的未來譜寫一張最具堅實民意基礎的發展藍圖。

羅奇如鬼蜮 再唱衰香港圖以港遏華

鄭嫣然

羅奇是可憐的。古有名為「蜮」的害人水怪，含沙射影，只要聽見人聲，就會發動無差別攻擊；今有美國前投行高層羅奇，因對華的政治偏見作祟而一葉障目，沉迷於自我編造的悲觀敘事中，自2024年就開始唱衰香港經濟，搞以港遏華的把戲，近期再度全方位惡意抹黑香港。

羅奇並不客觀，世人皆知他基於「白人特權」偏頗視角，字裏行間帶着種族歧視和刻板印象，說什麼「舊香港已完結」，香港已不再是真正的「國際化市場」，而是淪為「為中國（內地）企業融資的平台」，無不透出西方殖民思維和所謂「老錢」階級的焦慮，面對香港脫離海外資本掌控，不再任其擺布，羅奇之流對自身生存價值產生了迷惘，進而轉化為卑劣無恥的對港攻擊。

傲慢言論暴露焦慮恐慌

羅奇是可悲的，因為他慌了。白人階級設定的「竹子天花板」無形障礙，或許在美國亞裔身上行得通，而香港回歸祖國後煥發新生，發揮「一國兩制」的獨特制度優勢，「東方之珠」以自由、開放、高效和公平的營商環境享譽全球，不但持續在傳統金融、貿易和自由市場領域保持絕對領先，更透過吸收人才、創科研發、數字轉型、智慧城市的新政策，屢創輝煌，展現出極強的全球連結樞紐魄力。

大量國際權威報告為香港的成功投下信任一票。在友善營商環境方面，香港在加拿大菲沙研究所《世界經濟自由度2025年度報告》中，蟬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更在「國際貿易自由」指標再登全球第一位寶座。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最新發布的《2026年世界競爭力年報》顯示，香港競爭力排名攀升至全球第二位，在稅務政策與商業法規兩大子因素中更是高踞全球第一。

資本市場對接方面，2025年香港重奪全球新股集資榜首之位，共錄得119家新企上市，集資總額逾2,800億元，今年上半年的87宗新股上市，總集資額高達2,102億元，約為去年同期的兩倍，更有逾500宗上市申請正待處理。

外匯與貨幣管理方面，香港作為全球最重要的離岸人民幣樞紐與國際金融中心，在「穩健貨幣」和「監管」體制排名中高踞全球第三位。全球貿易方面，香港在2025年位列全球第

五大商品貿易經濟體，商品貿易總額按年上升17.5%，達15,850億美元的佳績。

經濟民生法治欣欣向榮

普羅大眾對經濟欣欣向榮感受得最為真切，各行各業發展蓬勃，市民安居樂業。適度補充勞工，舒緩特定行業的嚴重人手短缺，有效減輕本地員工壓力，亦提升整體服務質素。本地經濟錄得持續穩健增長，由2022年的收縮3.7%，轉為去年的增長3.6%，而今年首季經濟增長更達5.9%，創下五年來最強勁的單季升幅。

羅奇是可笑的，他的謬論充滿了「他者論述」，滿是壁壘，界定「自我」與「非我」大搞分化。在全球化大融合中，此類不對等的言論，完全不合時宜。特區政府絕不故步自封，透過不斷打破壁壘，充分發揮「一國兩制」下的「雙重核心優勢」，做好「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超級聯繫人」與「超級增值人」，行政長官率團中亞、中東行就是最佳例證。

香港奉行與國際接軌的普通法制度，是營商環境的定海神針，大大增強環球投資者信心。國際反貪組織「透明國際」最新公布的廉潔指數排名，香港位列亞洲第二及全球第12位。當前地緣政治格局急速演變，香港以良好的法治、穩健的制度優勢、開放的市場和持續的創新投入，積極建設兼具安全與增長機遇的財富樞紐，吸引大量中東及國際資金投下堅定信任票，去年本港註冊認可基金錄得3,570億元的資金淨流入，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全球領先財富管理中心的地位。

羅奇是可恥的，其狹隘的經濟觀短視近利，無視人類的幸福感與獲得感。他批評香港的移民政策，對特區政府在教育、創新科技及引進人才方面的卓越政策成效視若無睹。事實上，香港位列全球十大「領先未來城市」，亦在世界人才競爭力排名一舉攀升至全球第四位，取代新加坡成為亞洲之冠，這些成就均離不開特區政府致力建設「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政策。

為進一步提升香港國際大都會的非凡活力與經濟韌性，特區政府正全速編制香港首份五年規劃，主動融入及服務國家發展大局，腳踏實地，以清晰產業多元化升級藍圖及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決心，反駁別有居心的無恥唱衰者！

AI不應被資本綁架 須做好規範惠及大眾

沈逸 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



《華爾街日報》近日刊文稱，中國追求人工智能自主發展，卻仍需依賴一套「源自美國、經韓國市場驗證」的資本邏輯以獲得融資支持和認可。文章把中國科技股波動、韓國存儲芯片行情、DeepSeek和月之暗面的融資計劃放在同一條敘事鏈中，試圖說明中國人工智能越取得進展就越難擺脫全球資本市場的牽引。

這篇文章集中呈現了美國在人工智能發展中一個根深蒂固的認知誤區：人工智能首先被視為資本增值工具，衡量成敗的主要尺度是估值能否上升、融資能否擴大、企業能否建立足夠深的商業「護城河」。而當中國企業推出價格更低、權重開放、便於本地部署和二次開發的模型後，這套假設開始鬆動。這對美國而言，不只是技術挑戰，更是商業邏輯和價值尺度的挑戰。

人工智能競爭衡量標準變化

人工智能的根本價值，在於推動生產力進步，幫助人類解決現實問題。一個模型究竟有多大價值，不能只看資本市場願意給它多少估值，還要看它是否能夠進入工廠、醫院、學校、實驗室和公共服務系統，是否能夠減少資源消耗，提高勞動效率，促進知識傳播，為廣大中小企業和發展中國家提供可負擔的人工智能能力。

當前，美國和歐洲企業開始使用DeepSeek、通義千問、智譜和Kimi等中國模型，以降低調用費用並減少對單一開源服務商的依賴。這種變化表明，人工智能競爭的衡量標準正在發生變化。過去強調誰擁有最大的模型，今天越來越需要回答誰能讓模型真正用起來；過去關注誰能夠投入最多資本，今天還要比較誰能夠以更少能源、更低成本和更高效服務更多行業。中國開放模型所體現的資源友好型路徑，正在把人工智能從資本市場的稀缺商品，轉化為千行百業可以使用的生產工具。

衡量標準變化的背後，實質上是發展目的之問。實際上，中國對人工智能發展的理解，從一開始就超出了資本估值和企業排名。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級別會議閉幕式上發表主旨講話，明確提出，「中國始終堅持發展和安全並重，把握人工智能發展趨勢和規律，不斷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政策制度、應用規範、倫理準則，

確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讓人工智能這匹千里馬既跑得快又跑得穩」，體現出中方堅持開放共贏，推動人工智能賦能千行百業；同時強調確保人工智能安全可控，促進文明互鑒，完善全球治理。

中國人工智能發展戰略的核心，是讓人工智能回歸生產力和公共價值。中國強調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相結合，既發揮企業、資本和市場在創新中的作用，也通過國家戰略、公共基礎設施和產業政策解決長期投入、基礎研究和普惠應用問題。資本在其中承擔支持創新功能，而非反過來決定技術發展的全部方向。

走出認知誤區 看清未來

中國推動「人工智能+」行動，目的在於讓技術進入製造業、農業、交通、醫療、教育和科研體系。人工智能只有同實體經濟結合，轉化為更高效率、更優產品和更強公共服務能力，才能形成可持續價值。把人工智能鎖在資本市場和少數平台內部，可能製造驚人的估值，卻難以自動帶來廣泛的生產率提升。

中國的人工智能發展道路，關注誰能夠使用人工智能，誰能夠從中受益，誰有能力參與規則制定。它反對少數國家和企業依靠技術、資本和標準優勢形成新的壟斷，也反對以安全為名剝奪其他國家平等發展的權利。

讓技術只為資本增值服務，讓社會為無限擴張的算力和能源成本買單，讓發展中國家長期處於購買昂貴人工智能服務的位置，讓少數企業掌握模型、數據、算力和規則的解釋權，這是值得警惕的人工智能陷阱。資本可以支持人工智能創新，卻不應成為人工智能存在的最終目的。誰能把人工智能真正轉化為生產力，誰能讓更多人民以合理成本分享技術進步，誰能為全球南方提供可及、普惠和可持續的人工智能能力，誰才更接近這場技術革命的真正方向。

《華爾街日報》錯把中國科技股受國際資本市場牽連而波動，解釋為中國人工智能自主發展道路的矛盾，根源在於它仍然把人工智能視為金融資產，把美國模式視為唯一標準。可現實正在表明，高投入、高估值、閉源壟斷並不天然等同於先進，更不同於可持續。走出資本中心主義和陣營對抗的思維定式，人工智能才能擺脫歧途，真正回到服務發展、服務人民、服務人類共同未來的軌道上。